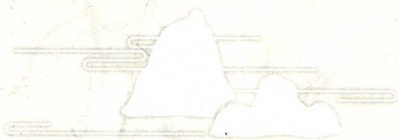




嶽麓書院 国学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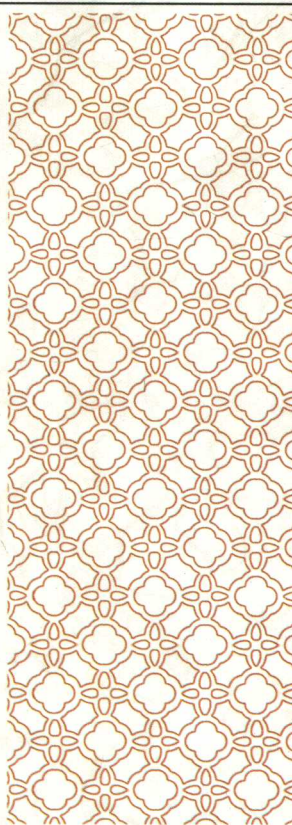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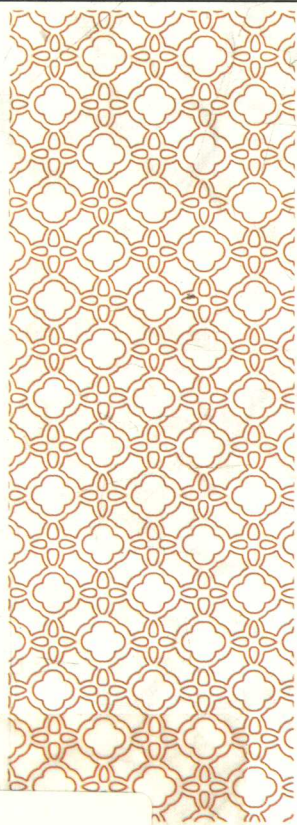
朱汉民◎主编



秦代官制考论

Qindai Guanzhi Kaolun

陈松长等著 — 中西書局





敦煌書院 国学文库

朱汉民◎主编

秦代官制考论

Qindai Guanzhi Kaolun

陈松长等著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代官制考论 / 陈松长等著. — 上海: 中西书局,
2018.11

(岳麓书院国学文库 / 朱汉民主编)

ISBN 978-7-5475-1480-1

I. ①秦… II. ①陈… III. ①官制—研究—中国—秦
代 IV. ①D69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07029 号

本书得到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秦代官制考论

陈松长等 著

责任编辑 徐 衍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200040)

印 刷 上海长城绘图印刷厂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51 000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5-1480-1/D·057

定 价 80.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T: 021-65315462

本书出版获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2013年度招标课题项目（项目编号13YBA374）资助

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工作指导委员会

主 任：许又声
副 主 任：李友志
成 员：李湘舟 王柯敏 吕焕斌
周发源 刘克利
办公室主任：殷晓元

岳麓书院国学文库编委会

学术顾问（按姓氏笔画排名）：

汤一介 张岂之 李学勤 杜维明

饶宗颐 袁行霈

主 编：朱汉民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名）：

卜宪群 王子今 王继平 张怀承

吕锡琛 刘海峰 朱汉民 李 零

李存山 肖永明 陈 来 陈 致

姜广辉 洪修平 莫砺锋 郭齐勇

黄俊杰 黄朴民 葛兆光 廖可斌

办公室主任：李 兵

岳麓书院国学文库总序

“岳麓书院国学文库”即将陆续出版。借为这个文库作“总序”的机会，我想讨论一下这样几个问题：现代世界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传统国学还有什么意义呢？“国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吗？国学与岳麓书院有什么密切的联系？

（一）国学的意义

我认为，对现代中国和世界而言，国学至少有四个层面的重要意义。

第一，国学能够为现代人的个体精神需求提供思想营养。中国正面临社会的急剧变革，每个人的命运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每个人的行动也有更多的选择自由，但是，能够给我们驾驭命运的精神方向、作出行动选择的人生智慧却严重不足。现代中国人往往会感到是非的迷茫、得失的困扰，同时引发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一般民众是这样，那些成功人士也是如此。儒家、道家、佛家的经典，诸子百家的思想，对人生意义的选择，包括是非的迷惘、毁誉的困扰、得失的彷徨，以及对人生终极价值的选择，都能够提供很多很好的思想营养。今天很多人思考的问题，我们回头去看经典，其实古代先贤都已经有很好的思考了。

第二，国学能够满足当代社会建立和谐社会的需求，并提供重要的文化资源。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我们正面临着种种社会问题和思想危机。我们常常感到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缺乏信任，我们担心超市里买来的食品未必安全，我们怀疑来自陌生人的帮助可能藏着恶意，我们甚至还在讨论见到老人摔倒该不该扶起；还有许多人损人利己的做法，已经到了完

全不能容忍的地步。诚信危机、道德危机成为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的大敌。大家都在想,怎么来防止相关恶劣事件的发生,怎么来建立一个有诚信、有道德的和谐社会。中国传统国学,对于如何建立有诚信、有道德的和谐社会,有着一系列重要的思想,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忠恕之道,仍然可以成为建构现代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仍然是我们建立有诚信、有道德的和谐社会的金科玉律。

第三,国学能够为当代中华文明的崛起提供重要的支撑力量。当前的“国学热”其实和中华文明的崛起有着密切关系。中国崛起与中华文明崛起不是一个概念。中国崛起是指一个独立的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强大,而中华文明崛起则是强调一种延续了五千年的文明体系在经历了近代化、全球化的“洗礼”之后,重新成为一个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文明体系。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文明是唯一历经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原生形态的古文明,并且一直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但是,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国被瓜分、侵略的历史,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人开始失去文明的自信。其实,近代中国学习、吸收西方先进文明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们必须坚持中华文明的主体性,采取对自我文化的虚无态度是非常不应该的。我们必须有一种文明的自我意识,我们要认识到,现代化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崛起。我们活下来并且能够昂首挺胸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身体,首先应该是我们高贵的精神和灵魂!那么,我们高贵的精神和我们的灵魂是如何形成的呢,其实,就是国学熔铸了我们的精神和灵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学能够为当代中华文明的崛起提供重要的支撑力量。

第四,国学能够为 21 世纪新的人类文明建构作出重要的贡献。我一直认为,中国国学里面所包含的许多价值观念,比方说仁爱、中和、大同,不仅仅对中华民族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它们一定能够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念,能够弥补某种单一文明主导的价值观念的缺失。西方文明一直在坚持他们倡导的许多核心价值。其实,中华文化近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接受这种西方价值的过程。但是,许多中国人在此过程中,却忽略或者忘记了中华文明中的价值理念。特别是在整个 20 世纪的文明史上,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文明已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21 世纪建构的人类文明,一定是一种多元一体的文明,而延续五千年没有中断的中华文明,一

定会对 21 世纪的人类文明建构作出自己的贡献。

（二）国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尽管国学如此重要，但对国学是否可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学界内部还存在着不少疑虑与分歧。人们首先会问，国学的确切定义是什么？其实，“国学”有非常明确的内涵和外延。首先，“国学”的“国”应该是指中国，这个很明确。其次，这个“学”就是指传统学术，即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这种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总是要通过文字、典籍的形式固定和保存下来。中国古代文献典籍有经、史、子、集，所以今天人们所说的国学往往也分为经、史、子、集。

人们又会进一步追问：国学的知识构架和学理依据是什么？当然，国学之所以可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必须要有两个重要条件：其一是国学学科体系的内在条件，即国学体系的知识构架和学理依据；其二是国学的外在条件，即国学能否具有现代学术视野进而能得到普遍承认并开展广泛的或全球化的学术交流。

国学这门学科，之所以学界还有不少疑虑与分歧，与它在当代中国学术体制内的处境有关。现在大学院系的分科，基本上是近代引进西学而建立起来的，分为理学、工学、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政治学、教育学等等。尽管近些年各个大学纷纷创建了国学院，但是国学在当代中国的学术体制内并无合法性的身份。这样，我们延续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国学，在这种学科体制下只能变成其他学科的材料。比如国学中最重要的经学，在现代大学的学科中就没有合法的独立地位，我们不能独立地研究、学习经学，只能够将其分别切割到文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法学、宗教学、教育学的不同学科。这样，国学中的经、史、子、集的不同门类知识，全部被分解到了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政治学、教育学的不同学科视野里面，变成其他不同学科的材料。

近代引进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政治学、教育学的不同学科，对于拓展我们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视野，确实有它的长处，但也有其短处。中国传统学术是一个有着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其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有着内在联系。当我们用各门现代学科把传统国学分割之后，就有可能

失去原来知识体系的联系和特点。每一种知识体系或学科框架,实际上是我们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具有主观性因素的图式。不同文明有不同的把握世界的图式,西方知识体系有它自己的长处,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也有自己的长处,譬如中国的知识传统具有整体性、实践性、辩证性的特点,以此成就了中华文明的世界性贡献。正因为如此,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应该保持对其原文化生态的、有机整体的学问特点的思考。国学作为这样一种原文化生态的、有机整体的学问,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其实,在讲到中国“国学”合法性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暂且借用西方大学的“古典学”的概念。在西方世界许多大学都设立了古典学系。这个古典学研究什么呢?它最初是以古希腊、罗马的文献为依据,研究那个时期的历史、哲学、文学等等。古典学的特点是注重将古希腊、罗马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不是分别研究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历史、哲学、文学。在西方,古典学一直是一门单独的学科。我们认为,“国学”其实也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学”。如果我们用“中国古典学”来说明中国“国学”,可以为“国学”提供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上述两个条件。一方面,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中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具有典范意义的文明体系。建立“中国古典学”,也就是以中国古人留下的历史文献为依据,将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由于“中国古典学”是以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为学科基础,这是一门从学术范式到知识构架、学理依据均不同于现有的文学、历史、哲学学科的独立学科,这是“中国古典学”得以确立的内在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国学”概念仅仅能够为中国人自己使用,西方人则只能使用“汉学”,以“中国古典学”来定义原来的国学,“国学”具有了知识共享、学术交流的现代学科属性,并能兼容国学、汉学,为中外学者所通用,这是国学能够具有现代学术视野并能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外在条件。

(三) 国学与岳麓书院

书院是一种由古代儒家士大夫创办并主持的学术教育机构,它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组织制度、基本规制、讲学形式,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书院继承、发扬了中国优秀的教育传统,表现出儒家士大夫那种追求独立的学术思考、人格自由的精神。书院将中

国传统教育和传统学术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从而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蓬勃发展,宋元明清学术文化思潮迭起,无不与书院这种独特学术教育机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岳麓书院是中国书院的杰出代表,在中国教育史、中国学术史上居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其有着悠久的办学历史和卓著的学术成就,受到人们的普遍敬仰。继先秦诸子等学术思潮之后,两宋时期兴起了理学思潮。理学以复兴先秦儒学为旗帜,要求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力图使儒家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振兴;同时,它又吸收、综合了佛、道两家的学说,将儒学发展为一种具有高深哲理的思想体系。岳麓书院创建于宋代,很快成为新兴理学思潮的大本营,学术界一大批有影响的著名理学家纷纷讲学于此。南宋乾道年间,被称为“东南三贤”的张栻主持岳麓书院讲席,在此聚集了一大批理学之士,并且形成了当时学界很有影响的“湖湘学派”。同时,后来被誉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著名理学家朱熹两次在岳麓书院讲学传道,更是形成了学术鼎盛的历史局面。岳麓书院成为宋代学术文化史最著名的四大理学基地之一。之后,许多著名理学家纷纷来此讲学。南宋后期,著名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讲学岳麓书院;明代中叶以后,理学思潮中的心学一派王阳明及其弟子王乔龄、张元忭、季本、邹元标等亦纷纷来岳麓书院讲学,岳麓书院因新兴的心学思潮再度发挥极其重要的学术大本营的作用。明清以来,中国学术文化又发生重大变革,先后出现清代理学、乾嘉汉学、今文经学等不同的学术思潮,而岳麓书院一直是不同时期学术思潮的重镇,从而推动着中国传统学术的创新发展,继续在中国学术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可见,岳麓书院在一千多年的办学过程中,一直是中国传统国学的重镇。宋以后的各种学术思潮、学术流派均以它为学术基地,如宋代理学派、事功学派,明代心学派、东林学派,清代乾嘉学派、今文学派等等,学术大师如朱熹、张栻、陈傅良、王阳明、王文清、王先谦、皮锡瑞等在这里传道授业,培养了一代代国学领域的著名学者。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下诏全国各地改书院为学堂,岳麓书院也于1903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后来又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堂、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遗址在战乱年代,一度受到严重损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湖南大学全面修复岳麓书院,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岳麓书院古建全面修

复,基本上恢复了历史上办学最盛时期的建筑规制。与此同时,我们启动了岳麓书院国学研究、教育的复兴工程。近二十多年来,岳麓书院培养、引进了一批国学研究的学者,逐步建立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点及博士后流动站。岳麓书院学术、教育功能的恢复,是建立在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及学科建设基础之上的。今天的岳麓书院已经成为国学复兴的重镇。岳麓书院的明伦堂仍是讲授国学的讲堂;朱熹、张栻“会讲”的讲堂仍在举办国学论坛,斋舍也仍然是学者从事国学研究的场所。作为古代学术传统内核的经学、理学、诸子学、史学及其相关的知识学问,均成为岳麓书院的主要学习内容和重要研究方向。国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生态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学术文化类型,作为一种具有民族主体性的学术文化,国学确实不同于西学,因为它有不同于西学的文化土壤与生态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学与书院有着共生的独特文化背景。

我们有一种传承中华学脉的强烈愿望,希望推动岳麓书院学术的现代复兴。岳麓书院的现代复兴,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发生的一个重要文化教育现象。我们相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我们完全可以做好书院文化传统的转换、创新工作。所以,我们编辑、出版“岳麓书院国学文库”,也是与传统国学的当代复兴有着密切关联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书院、学者加入到这个行列来,盼望国学界的研究者能够不断赐稿,共同推动当代国学的繁荣!

朱汉民

甲午年于岳麓书院文昌阁

前 言

凡从事秦汉历史研究者,都一定会对秦汉的职官制度给予高度的关注,因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制度,大都是由秦汉时期发展而来的。而秦代更是其奠基的时代,故秦代官制研究,不仅是秦汉史研究,也一直是秦简牍文献研究中的热点,更是秦简牍内容研究中绕不开的课题。

自岳麓书院藏秦简从 2008 年开始整理以来,我们就在简文中不断地发现,岳麓秦简中所记载的一些官名、官署名有很多是未见于前人著录的,如“执法”一词,在岳麓秦简中就反复出现,它既有跟丞相、御史并列使用的情况,也多与“属所”连用而组成所谓的“属所执法”等,从其出现的语境可知,秦简中的“执法”肯定是作官名或官署名使用的,但传世的秦汉文献中“执法”一词则出现得很晚,且一般作为一个动词在使用。这种现象,说明新的秦简资料又给秦代官制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因此,很有必要借助新出的简牍材料和其他的出土文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对秦代官制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有鉴于此,我们自 2013 年整理出版了《岳麓书院藏秦简(叁)》之后,就向湖南省社科规划办申报了“秦官制研究”的课题,很快就得以批准立项。原本是想在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的基础上,借助新出的简牍、玺印封泥和青铜器铭文等材料,对秦代的职官制度再作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但随着课题的展开,发现这种相对浩大的工程,远不是这个项目规定的时间内所能完成的,因此,我们对课题研究的思路作了一些调整,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秦代官制中一些专题的讨论上,故将课题名称改为“秦代官制考论”,其构想是在借助新的出土材料考证补注一些秦代职官名义的同时,主

要围绕秦代的守官和假官制度、都官制度、乡里职官制度及官吏法等方面展开研究。通过近两年的努力,集结成这本小书。书虽有点单薄,但每章都是专题的研究,这些研究的结论不一定完全成立,但如果能给秦汉职官制度研究和秦汉史的研究提供一点参考的话,那我们也就满意了。

参加本课题研究的王伟、邹水杰和周海锋三位都是研究秦汉史和秦代职官制度的中青年学者,他们虽各有专攻,但都对以新出的秦汉文献来考论秦代职官制度的某些问题颇感兴趣,因此,在充分尊重他们各自研究兴趣的基础上,我初拟了一个研究提纲,然后他们各自在自己长期研究积累的基础上选择撰著了本书的部分章节,其中周海锋负责第一章和第六章,王伟负责第二章和第三章,邹水杰负责第四章和第五章,最后由我负责全书的统稿和编排,可以说,本书的最后完成,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成果。本人因种种原因,未能具体撰写某些章节,仅有在此期间所写的两篇与秦代职官研究有关的小文,且作附录编于书后以向大家请教。

本书的出版要感谢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的资助,同时要感谢中西书局的大力支持,可以说,没有这方方面面的支持和赞助的话,本书的出版将是不太可能的事。

陈松长记于斯是斋

2018年2月28日

目 录

第一章 秦代官制研究综论	1
第一节 秦代中央官制研究	1
第二节 秦代地方官制研究	13
第三节 秦代官员的选拔、任用及考核研究	21
第四节 以出土文献为切入点的秦官制研究	25
第二章 新见秦代职官与官署名考	34
第一节 新见秦中央职官与官署名考	34
第二节 新见秦郡县职官与官署名考	81
附新见职官官署名一览表	88
第三章 秦代守官、假官制度考论	112
第一节 秦汉守官、假官研究概述	112
第二节 秦和汉初出土文献所见守官、假官资料的初步研究	121
第三节 秦代守官、假官的性质与特征	129
第四章 秦代都官制度研究	138
第一节 秦简“都官”研究史	138
第二节 秦简中有关都官记录的疏证	144
第三节 秦简所见地方都官制度	169

第五章 秦代乡里职官制度考论	178
第一节 秦代乡里社会的居住形态	178
第二节 秦代乡部吏员的设置与运作	200
第三节 秦代里吏的配备与运作	215
第六章 秦代官吏法与执法吏考论	229
第一节 岳麓秦简《置吏律》及相关问题	229
第二节 执法吏考论	245
附录一 岳麓秦简中的几个官名考略	249
附录二 新见秦印“江湖榦官”考论	256

第一章 秦代官制研究综论

清代湘籍学者孙楷先生在《秦会要》一书中专列“职官”一门，对有关秦官制材料进行了梳理，间有著者个人之考订，是研究秦官制必备之工具书。此书后又陆续经过徐复以及杨善群二先生增补，更加便于使用。然《秦会要》亦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如金少英先生在《秦官考——“秦会要订补职官篇”补正》中指出，其“所辑不免踳驳，序官尤多可议”，包括后来徐复先生之订补也是大醇小疵，“详于因革，大多以六国证秦制，而斟正殊鲜，仅增导官校官及纠占梦博士与司马侯之谬二条而已”。^① 金少英可谓孙楷之功臣，《秦官考》一文凡“订正二十余事，增补五十五事”。比如指出相分左右不始于秦武王，《史记·齐太公世家》：“景公立，以崔杼为右相，庆封为左相。”杨善群先生又在前人基础上，对《秦会要》一书进行全面订补，增加了不少出土材料，吸收了最新研究成果，使得此书更便于使用，厥功甚伟。然《秦会要》作为政要类典籍，功用若类书，将相关材料按照一定体例编排是为了便于检索，至于材料之真伪虚实，编撰者常无暇顾及。故严格来讲，此类书籍谈不上研究性，可为研究津梁而已。

由于秦所设之一整套官制对后世历代政制有重大影响，故古往今来的不少学者对此领域的研究十分感兴趣，留下了不可胜计的成果。兹拣其颇具代表者，分四大版块对秦官制研究之成果加以系统梳理。

第一节 秦代中央官制研究

安作璋、熊铁基两先生合撰的《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4—1985

^① 金少英：《秦官考——“秦会要订补职官篇”补正》，《西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58年第1期。

年)一书是秦汉官制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此书对秦汉官制进行了系统论述,文献中所见之秦汉职官几乎都有讨论,资料翔实,妙论纷呈。安作璋、陈乃华的《秦汉官吏法研究》(齐鲁书社,1993年)一书全面论述了秦汉时期对官吏的立法理念与政策,以及具体法制实践中对官吏实行的各种法律控制。张晋藩、王超《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韦庆远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通史·战国秦汉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陶希圣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南方印书馆,1943年)第二册(曾资生撰)、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等著作中的部分章节均对秦代职官制度有所讨论。

《汉书·百官公卿表》:“相国、丞相,皆秦官。”杜佑《通典》云:“始皇始置相国。”《事物纪原·相国》载:“秦置官,始皇帝立,尊吕不韦为相国。汉初萧何亦为之,今人以呼宰辅也。”“相国”在秦时称为“相邦”,“丞相”与“相邦”之异同,学者多有论述。杨宽先生认为相、丞相、相邦乃一职异称而已,^①马非百先生也认为相国与丞相是一回事。^②安作璋、熊铁基先生认为:“丞相,是正式的官名,而且是从秦国开始,在秦朝确立的。相国,是人们对丞相、也是对其他名称的宰辅的尊称。”^③林剑鸣先生在《秦代中央官制简论》一文中认为秦武王设置左右丞相的目的“无疑是分散相权,易于国君控制”,并认为御史大夫的设立也是为了牵制相权。^④韩养民《秦置相邦丞相渊源考》认为相邦创立于三晋,秦惠王十年仿三晋制度,初置相邦。秦武王二年后,相邦不止一人。秦王政十年后改相邦为丞相。相邦、丞相间官名相异,职责、地位相同。^⑤聂新民、刘云辉《秦置相邦丞相考异》一文认为相邦与丞相是两种官职,相邦地位尊于丞相,相邦常由一人担任,丞相之职分属两人,相邦制定基本国策,一般由有特殊功勋的客卿担任,王室成员不

①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04页。

② 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第479页。

③ 安作璋、熊铁基:《秦汉的丞相制度》,《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5期。

④ 林剑鸣:《秦代中央官制简论》,《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

⑤ 韩养民:《秦置相邦丞相渊源考》,《人文杂志》1982年第2期。